

中国农村面临决定性巨变

□方 言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来安县 60 多岁的农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增收了近千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宣布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中国“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带给中国农民的最大福音。

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咏着“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的农诗 唱着“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只留一斗完婚嫁 愁的人来好白头”的民歌，忧愁而无奈地抒发着内心的苦恼 农耕苦、苛税重。

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农业的耕作方式、土地制度乃至国家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中，但中国农民却始终处于税赋制度的最底层。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各级官吏则要“催租求考课”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直到中国政府终结“皇粮国税”的宣言发表，中国人才第一次相信，

“种地”与“交租”并非天生一对 苛捐杂税理应远离农民。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事关农村经济利益大调整的重大决策，目的在于真正实现“耕者有其利”。

中国政府的农村税费改革因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 也被称为 1949 年以来继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的“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内的改革，而是一场关系到农村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如何去适应经济基础的一个大改革，它必将全面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步伐 以帮助占世界人口 15% 的 9 亿农业人口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共享发展成果，既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深刻的改革也将这样的课题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农业税减免之后，财政缺口如何填补？乡镇机构如何改革？基层干部如何服务农民？还有哪些相应改革要跟

上？随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了第一步，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

免税 贯彻“新重农观”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严苛的税赋制度的最底层。就在前几年，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 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也许有人并不知晓，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 税率达到 8.4%。

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为“公粮” 单纯就农业税而言 也许负担不算重 然而 在很多地方 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 而是五花八门。在背负着众多税赋与收费的广大农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头税 农业税 轻 二税 提留统筹 重 三税 集资摊派 是个无底洞。”

资料显示，一些地方机构人员臃肿 平均每 30 位中国农民养活 1 名乡镇干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国每年征收约 600 亿元人民币的农业税。从 1996 年到 2000 年 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幅连续 5 年递减。

“为农民减负 帮农民增收”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2000 年 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一征收 40 多年的税种被取消。

事实上 这些地区的减税 并非执行国家的“规定动作” 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推出的“自选动作”。人们看到 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事实上恰是越贫困的地区，才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 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中国农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但只有这一次才真正距离理想这么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说。2004 年 3 月 5 日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郑重承诺，5 年内免除农业税。而今，这个时间表又提前了 2 年。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提前宣告终结，体现的正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新重农思想”。

理应反哺“母亲产业”

2004 年，中国农业画出了一条漂亮的上行曲线。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的影响下，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4550 亿公斤预期目标，5 年粮食减产局面一举扭转。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预计超过 5% 是自 1997 年以来增幅最大的

一年。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全国农民一共减轻农业税负担280亿元，农民税费“减负”幅度普遍达30%以上。

数字和事实都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超过1万亿元。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方面是农业、农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是国家财政投入长期以来偏重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高付出与低投入的强烈对比，其中的“隐性”贡献更为巨大。

当工业“长大成人”我们不能再无休止地吸吮农业的“乳汁”。“理应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反哺我们的‘母亲产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张连珍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也应是社会文明进步成果享受者。

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3万亿元，中国尽早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去年一些减免农

业税的省市财政收入增长仍然超过20%，这为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支持。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曾业松研究员说：“提前两年实现农业税的免征，一方面表明了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正如新一届政府强调的那样，“‘三农’问题仍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取消农业税入手。”

虽然从国情出发，我们还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农民大量的补贴，但这毕竟已经开始。

中国政府解决 “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去年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单”，但专家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帮忙”，在高粮价的比较效益下，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警号”。

“高价农资”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化肥价格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粮食增产带来的收益。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资价格出现历史罕见的淡季逆势上涨趋势，2005年农资市场调控难度加大。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冷静指出，当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存在四大

“软肋”：

一是耕地、淡水资源短缺，从 1996 年到 2003 年 7 年间 耕地减少了 1 亿亩；

二是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 45% 左右，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 30% 左右；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主灌区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到 4 成，配套率不足 7 成，低中产田的比例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2/3；

四是承受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压力。

显然 解决上述问题 仅靠中央的一号文件 等惠农政策已远远不够。从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中国政府正从多方面着力破解“三农”难题。权威人士认为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从“一点突击”到“多点推进”的变化 折射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线图。

——告别“皇粮国税” 财政承担 800 亿元缺口。财政部负责人表示，到明年中国将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征收的税种 包括农业税、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三个税种加起来税收约 800 亿元。

减少的税收收入，80% 左右由中央财政承担，20% 左右由有关的省、市、自治区按照一定的政策承担 主要是东部地区 全额保证将减少的这块收入转移支付给县、乡。

——150 亿元改善县、乡财政困难局面。县、乡是中国行政运转

的最基层单位 因为历史、体制等复杂原因，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和粮食主产区的县、乡出现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财权上收，事权下划，造成了基层财政运转困难。

据透露，中央财政将拿出 150 亿元加大“输血”和“造血”力 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 帮助县、乡摆脱财政困难。

——再提 2.4 个百分点，国债支农资金比例不降反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姜伟新表示，今年国债投资安排尽管有所减少，但仍向“三农”倾斜。初步安排用于大农业（农、林、水、气）的投资比例，比 2004 年再提高 2.4 个百分点。一些有条件的项目，很可能在年度执行中再增加投资。

——293 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

——14 亿元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安排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资金 4 亿元，安排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补助资金 10 亿元……

中央党校曾业松研究员说，今后在“支农”“补农”的政策上既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 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 加大力度 增强政策的“边际效应” 实现农民的增富减贫。

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必须抓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 切实保护好耕地 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粮，建立销售协会等中介

组织，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 影响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增长永远赶不上 消费支出的增长？

专家指出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确实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来。

记者在江苏镇江调查时，看到这样一份让人欣慰的农民增收“成绩单”：

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 5372 元 比上年增长 13.5% 并呈现出几大亮点：工资性收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比上年增长 15.5% 税费支出大幅下降 去年全市农民负担总额同比下降一半；粮食直补全部兑现 全市人均 19 元。

然而 细算农民的支出账时 就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分析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农民平均支出 3798 元 占收入 7 成以上。

这其中 食品、住房、医疗等生活性支出达到一半；农民的生产费用支出比上年增加了 40.4% 除种地投入增加外，部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 教育支出占第三 占 15% 左右。

这表明 农民增收的成果 有相当一部分被支出的增长抵消，真正的收入积累还不是很多。

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 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 农民

供孩子上学相当“吃力”农村学校因资源短缺也难以继。

来自吉林省农调队的一份调查显示 全省 200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7%，而农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则增长 25.8%。

如果说 教育成本过高 特别是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已经成为部分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是与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不相称的话，那么另一困扰广大农民的问题就是“看病难”这几乎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阴影。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就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

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 100 多个村庄的调查表明 有 32% 的婴儿是在家里出生的 有 78.6% 的农村人口是在家里死亡的。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1998 年至 2002 年 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02% 下降为 0.69%。占全国近 70% 的农村人口 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 33%。

“没有 9 亿农民的健康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

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一些专家指出，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就永远赶不上消费支出的增长。

人们看到，免征农业税后，中国政府仍然面临多重考验：如何防止农资涨价、教育医疗支出“掏走”免税实惠，不再扮演“收税者”的广大乡镇干部工作如何定位，乡村集体如何开展农村公益事业，乡村债务黑洞如何填平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能否持续提速。

有专家认为，在中国农村，冗官、冗员现象十分突出，这与基层政府有权收税、收费有直接关系。免去农业税，也就直接收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因取消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可以消化解

决，并能迫使基层政府削减冗余人员，这将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全国人大代表史和平提出：“农业税取消实际上是一个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政府应当考虑的就是农村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鼓励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资投入农业开发，并且注意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

曾业松研究员表示，取消农业税后需要做的是“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而且这是“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同时需要改革的还有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和土地管理制度。这些改革一旦同 9 亿农民联系起来，都将成为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硬骨头”。

（摘自《环球》）

粗茶营养更高

以绿茶为例，绿茶素以最嫩、最鲜的茶叶为贵，但从营养角度来看，并非价格昂贵的新茶一定胜于价格低廉的粗茶和老茶。新茶多为嫩芽，叶片很薄，其中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物质，几乎不含茶多酚、茶丹宁以及茶多糖之类苦味物质，所以喝起来口感醇香绵和。随着日照时间增加，茶叶叶片变得肥厚，茶叶中大量积累多酚类物质与丹宁，此时采摘的茶叶味道较苦，即我们常叫

的“粗茶”。

茶多酚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能抑制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的伤害，有抗衰老作用。它还能阻断香肠、火腿中亚硝胺等致癌物对身体的侵害。茶丹宁则能降低血脂，防止血管硬化，保持血管畅通，维护心脑血管的正常功能。茶多糖能缓解和减轻糖尿病症状，有降低血脂、血压等作用。所以，从健康角度看，粗茶的营养价值反而更高。

（摘自《环球时报·生命周刊》芮莉莉文）

中国经济需要减速

□尹中立

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金融风险，而房地产行业投资的连续高速增长带来了钢铁、电力和煤炭的短缺。可见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房地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事关宏观调控工作的成败。当前的中国经济需要减速而不是加速，与 1998 年的环境正好相反。

一、高层认识为何统一？

最近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的变动，透露出的第一强烈的信号是决策层对房地产市场的认识得到了统一。

在此前，高层对房地产市场的认识并不统一。最早对房地产行业提出预警的是央行 2002 年 8 月在重申了“低利率、鼓励个人住房信贷、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之后，央行首次提到要“防止产生房地产泡沫 防止信贷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但是央行的预警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2003 年之后央行对房地产市场政策的关注度不断增加，2003 年 6 月，央行终于下发了被业界称为“121 号文件”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该通知重申了商业银行不得给自有资金比例低于 30% 的房地产商贷款的规定，但是时隔不久，国务院又出台了 18

号文件，业界普遍认为这个文件是对央行 121 号文件的一个否定。2004 年的关于“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中，我们也能够明显注意到国家部门之间意见的不统一，最明确的标志是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观点上的不一致。

2005 年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问题列为价格工作的两个重点之一 5 月份，与房地产有关的七部委又联合出台文件，它充分地反映了中央各部门在对房地产泡沫问题的认识上得到了统一，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为什么高层对该问题的认识得到了统一？最高决策层对房地产市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98 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与消费，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的是

通货紧缩的压力 但 2003 年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部分行业的过热现象 煤、电、油、运全线告急 进出口连续几年增长超过 30% 加剧了中国经济与外部环境的摩擦，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喋喋不休。尤其要注意的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就是房地产行业，没有房地产行业投资的连续高速增长，就不会有钢铁消费与生产的高速增长，也就不会有电力的紧张和煤炭的短缺，运输的压力就会缓解。可见，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房地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事关宏观调控工作的成败。当前的中国经济需要减速而不是加速 与 1998 年的环境正好相反。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金融风险。经过 4 年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已经占银行总量的相当的比重 房地产金融的风险越积越高 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充分重视。以上海市为例，2004 年，在投资和各项贷款增速明显回落的背景下，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继续呈高位运行态势，推动上海房地产贷款继续强劲增长。上海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自营性房地产贷款累计增加 1023 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比例高达 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累计增加 728 亿元，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中长期贷款增量的比例高 48%。

二、调控点 为何转向地产价格？

调控的重点由房地产的投资规模转向房地产价格。2003 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指标中，投资率和投资增长速度都偏高。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放在调控投资规模上，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是控制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 但调控的结果并不理想 控制土地的结果是地价不断上涨，刺激了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的不断上涨必然使房地产行业利润率增加，而暴利的存在就会冲破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约束。事实表明 2003 年之后，大量的资金通过非银行的渠道进入房地产行业，企图通过控制土地和信贷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很难取得成功。

三、要从政治的角度 分析“新政”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社会矛盾会激化。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保持 7% 以上的速度持续 30 年以上 当经济总量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持续增长超过 23 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或社会动荡。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深刻背景。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时刻不能忘记“构建和谐社会”的宗

旨，不能够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分析房地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问题政治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因为获得适当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的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干预市场，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例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政府应该确保所有阶层都能获得住房，并规定政府各部门有责任制定住房计划，以保证下层人民的住房权利。

我国 1998 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1998 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以 2003 年为例，我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总投资为 600 亿元，只占当年房地产总投资的 6%，2004 年的

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占房地产总投资的比例不到 5%。因此，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我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我们迫切的任务，政策上对低收入群体的倾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房地产新政中，这一点反映得十分充分。

四、要管住地方政府

新政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各个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会列入到地方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内。我认为此举对房地产行政控制最有效，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因为中国部分房地产价格不健康的上涨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价格上涨。

一些地方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主要有以下五招：第一是大量拆迁，刺激市场需求；第二是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推动房价不断上涨；第三是抬高土地拍卖的价格；第四是控制和取消经济适用房；第五是操纵媒体，有的甚至操纵房地产统计数据，误导消费者。

可见，让地方政府对当地房价负责是有根据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该政策的效果可能不会太理想，要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摘自《南方周末》）

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许博渊

据说，中国人发明机关枪比德国的马克西姆早了 100 多年，发明者准备献给有关部门，被人劝阻，说别缺德了，造这种凶器干什么。几百年后，中国人吃力地追赶着西方科技发展的步伐，面对现实无法停步。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我们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力量对比将与鸦片战争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很难画出一道杠杠来，一般认为始自明朝中叶，因为元朝马可波罗来华的时候，还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得傻了眼。

明初，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装备还优于西方，但到 1492 年，即明弘治年间，哥伦布的船队已经到了美洲，我们却放弃了海外探索。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西方在天文、历算和火器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徐光启等官员要虚心地向他学习。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众说纷纭。

最接近事实的恐怕还是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

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视野，也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然而，为什么小农经济在中国延续时间如此之漫长？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求助于地理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了。

中西科技地位嬗变的 地理政治和文化政治原因

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希腊。希腊多山，缺乏可耕地，没有商业互通有无不能生存，又临着地中海，具备海上贸易的条件，于是，希腊商人遍布地中海沿岸。他们甚至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最远的到了黑海沿岸。

罗马帝国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全欧洲，野蛮民族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文化。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势力都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大。欧洲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他们在城市中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正如希腊商人带有海盗色彩一样，西方海洋国家在对外扩张中也

是能做买卖就做买卖，能抢劫就抢劫。这是一股能量极大的势力。宗教妨碍了它，于是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航海技术等等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

海外贸易和掠夺于是开始，这又刺激了制造业，也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于是就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推动了贸易，财源滚滚，又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欧洲人走过的道路。

中国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沃野千里，适合于农耕。庄稼是要人伺候的，农业经济对于社会环境的要求是社会稳定、劳动力稳定。

现实需要中产生了民族心理。中国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家乡热土。农民的眼光离不开一亩三分地，许多人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乡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地在地里劳作，只求有个好年景，好收成、好官、好皇帝。只要能吃饱肚子，他们就满足了。

对塞外的游牧民族和其他国家，中原农业区的人始终处于守势，筑长城在先，海禁在后。明朝既筑长城又实行海禁，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像种菜，把篱笆扎得严严实实，不让狗钻进去，不让鸡飞进去，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筑好了篱笆还不够。在这个篱笆之内，斗争始终不断，有时平缓一些，有时激烈一些。这就要求协调人际关系，稳定内部。于是，政治哲学，亦即治学就十二分地发达。于是乎，儒学就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于是乎，熟读圣贤之书的人就是治国之才，科举就成了选拔此种人才的途径。

没有商业竞争，
也就没有发明创造的必要

在中国，商人一直不吃香。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商人在等级排名中列末位“士农工商”还不如手工业者，比农民地位更低。

农民出身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尤其强烈，他高度重视农业，而抑制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他的子孙禁止民间对外贸易和人员流动，就是继承了他的思想。

清朝也如此。乾隆就说过：我天朝什么都有，不稀罕外国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

没有贸易，商品生产就没有必要。没有商业竞争，也就没有必要发明创造。没有对外拓展的激情，也就不必要了解外部世界；不参与争夺，也就不必要发展军事技术。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只能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以及人与人斗的技巧方面。统治者所有的精神就都集中在控制老百姓上面，百姓则把精神集中在对付身边的人身上，所以就养成一种文化传统，难以抱成

一团、一致对外 散沙一盘。结果如何？一是积弱，一是积贫。这两个词 清末民初用得最多。

全球化 将唤醒中国人的创造力

时至今日 如何求变？

不主动出击，被动迎战也可以，因为全球化将唤醒我们的创造力。

全球化不自今日始，早在 1492 年哥伦布的船队在圣萨尔瓦多抛锚时就开始了。但中国人是在西方人一脚踹倒了我们的篱笆，闯进了我们的客厅和卧室之后才发现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巨变的。于是乎出现了洋务运动，出现了第一条铁路，出现了造船厂 出现了兵工厂，一句话 出现了现代工业。

中国人开始了追赶。

但是，我们背负了太重太重的历史重负，追得好吃力，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可歌可泣。直到公元 1978 年，我们终于告别了人与人斗的传统 集中精力于生产、科技和教育。

请留心观察，我们正在一件一件地甩掉历史包袱，正在轻装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去年，我们把杨利伟送入了太空。几年之后，我们还将把中国人送上月球。

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发达国家为了保持他们的技术

优势，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如此艰难，本质上并非担心台海军事力量失去平衡，而是害怕中国获得现代技术，因为许多技术是军民两用的。

中国的财力还有限，不能向科学研究作大规模资金投入。

民间科研刚刚萌芽，自主创新还在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还在为跨国公司打工。

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连接还没有建立起来，科研成果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学校和科研机构目光短浅 追求目前利益 两眼都盯着钱。

学术腐败日趋严重，埋下了巨大隐患。

国家科研环境不理想，留不住人才，名牌大学成了发达国家尖端技术人才的摇篮。

我们的追赶依然十分吃力。

但是，我们不会停住脚步。全球化竞争不允许我们停步。如果停滞不前 那么 我们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力量对比将与鸦片战争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我们没有退路。

压力也是动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华民族这条巨龙必将焕发出青春活力，而腾飞于浩瀚的天空。

（摘自《环球》）

龙永图：中国不能赢家通吃

□张 毅

隆冬的一个上午 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高高的办公楼内，《环球》杂志记者与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进行了一场事先没有约定的采访，也可以称之为对话。

龙永图太忙了，邀请他出席各类会议的请柬络绎不绝，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想采访他。事先没有约定 也没有采访提纲 我直接闯进了他的办公室，采访和交谈是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

虽然时常在电视上见到龙永图的身影 但面对面 已经有 3 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他还是那么精神，一头黑发 反映敏捷 语言依然那么犀利。

入世 3 年最大的变化 是观念的变化

《环球》杂志 您认为入世 3 年来，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龙永图：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人们观念的变化。

首先是树立起规则意识，接受国际上通行的一些基本规则，确保中国的经济法律法规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通行的做法相一

致。入世以来，我们修改了许多法律 比如外贸法和外资法。

其次，加强了法律法规方面的透明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量削减了行政审批，取消了很多内部文件 提倡阳光政务 提高政策的透明度 公开透明。

第三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全国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这些都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条件。政策不透明，法律法规不接轨，根本无法参与经济全球化。

过渡期不是一个 很严谨的概念

《环球》杂志 最近许多人都在谈论后过渡期的问题，有人认为后过渡期面临的挑战会比过去 3 年更严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龙永图：过渡期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概念。在入世谈判的时候，我们说有些条款我们做不到 经过争取 对方同意缓

几年再执行，于是就有了过渡期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开放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我们并没有承诺。何时开放，如何开放，完全根据国内的需要来进行。至于后过渡期挑战更加严峻的说法，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过入世 3 年的努力，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世贸组织成员，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应对工作，完全可以变挑战为机遇。

为汽车工业 多争取了 1 年保护期

《环球》杂志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冲击问题。现在看来，中国汽车工业平稳度过了 3 年保护期。明年 1 月 1 日我们将取消汽车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估计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环球》杂志曾发表了一篇题为《进口轿车风光不再》的文章，从国内的进口汽车市场来分析，普通老百姓不买，政府部门不许买，进口汽车的消费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主要是一些富裕阶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龙永图：开放汽车市场是中国入世谈判最为艰苦的一个部分，何时取消进口汽车的配额许可证管理，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国内有人认为，汽车进口放开的时间越晚越好，至少将汽车进口许可证保留到 2010 年；但是美国人不同意，

他们希望中国在入世的这一天就取消配额许可证管理。当时拼死拼活地争，多争取了 1 年，争到了 5 年保护期（从 2000 年开始）至 2004 年底以前继续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前两年一辆汽车的许可证炒到十几万元，现在成了一张废纸。2005 年取消汽车进口许可证，进口汽车也不会大幅增长，一是市场有限，二是最近几年国内汽车工业发展太快，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样档次的汽车，进口车加上关税比国产车贵得多。如果我买车，也会去买 10 万元左右的国产车。

中国商品不能赢家通吃

《环球》杂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有所改善。3 年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2001 年是 5100 多亿美元，2004 年前 10 个月已经达到 9200 多亿美元，全年超过 11000 亿没有问题。在外贸快速发展的同时，贸易摩擦也在加剧。最近在西班牙甚至发生了烧鞋事件。是不是我们的外贸增长速度太快了一点？

龙永图：西班牙烧鞋事件是一个个案。中国有竞争能力的产品越来越多，外贸发展主流是好的，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省在外贸扩张阶段也曾走过这么一段：但要引起注意，要适当自律，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顾及一下出口国的反应。

《环球》杂志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说，到处可以见到中国货。一方面为中国货进入该国市场感到自豪，一方面又觉得中国货卖得太便宜。多年来，我们一直讲出口商品要“以质取胜”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在“以量取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龙永图：今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可以增长 30% 但是出口金额仅仅增长 5%。其他许多出口商品也是这样，数量增长远远超过金额的增长。一方面中国人赚的钱太少，另一方面人家也受不了。我们必须顾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要加强自律 要订一个价格约束机制 不能赢家通吃。

中国企业恶性竞争 是一个顽疾

《环球》杂志以前国内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抬价抢购 国外低价倾销”。什么“蚕茧大战”、“羊绒大战”此起彼伏。十几年过去 国内抬价抢购的现象没有了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恶性竞争的事件却层出不穷。国内一家国有电信企业老板讲过一个故事：非洲国家塞拉利昂要上 10 万线的程控电话系统，英国一家公司报价 500 美元一线，总计 5000 万美元。这家国企报价 100 美元一线 塞拉利昂很高兴 说英国人真坏，还是中国人好。结果国内一家民营企业插了一杠子，报

价 50 美元一线 把生意抢走了。结果塞拉利昂说英国人坏，中国人也不是好东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恶性竞争？

龙永图：我们的企业恶性竞争是一个顽疾，多少年一直解决不了。人世时我就讲过要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按照世贸规则，许多事情政府不能做 行业协会又不行 于是就出现了真空。

国外的行业协会很有权威，日本的行业协会对于出口企业的市场范围、产品品种、商品价格都有着十分有效的协调机制，尽管内部也有一定的竞争，但决不会自相残杀。

建立中国行业协会 的权威性

《环球》杂志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会有几千个，但是有权威性的不多。您认为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龙永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一些行业协会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我们的行业协会是官办的，成了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去处的地方。要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 这样才能有权威性 才能够发挥协调组织的功能。

（摘自《环球》）

中国需要低调一百年

□许博渊

一个在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的国家，保持一段时间的低姿态容易，在具备一定实力后仍然能保持低姿态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低姿态就需要大智大勇。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增，但浮躁也伴随而来。有些人整天嚷着要打仗，今天说要跟日本开战，明天说要和美国拼命。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人要做好‘领导世界’的准备，还说这是‘天命所归’。为了说明这是浮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

美国在同宗主国英国打仗争取独立时，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曾希望法国提供帮助，甚至许诺把西印度群岛送给法国。1783年打赢独立战争，美国这个新生国家就像一只初生的牛犊，四脚颤抖着站起来，走路时摇摇晃晃，只能采取低姿态。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96年发表了一个“告别演说”，告诫国人不要插手欧洲事务，不要订立长期同盟。他强调，美国应当向欧洲表明：“我们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这是美国对外“孤立主义”的源头。直到20世纪初，历时

百余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国力已经十分可观，跻身于强国之列。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总统，开始朝积极参与世界政治的方向转变，但步履谨慎，并未完全抛弃“孤立主义”政策。突出反映在努力避免卷入战争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劝告美国人民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严守中立。1917年1月，德国宣称：在某些海域，它的潜艇将击沉任何船只，不管是协约国的还是中立国的，而不予事先警告。威尔逊感到德国羞辱了美国，并且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才请求国会向德宣战。

多年后，美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奉行“中立政策”，向英法等国出售军备，大发战争财。当英国无力购买武器时，罗斯福还提出了“租借”的办法。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才不得不参战。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彻底抛弃了“孤立主义”，走上争霸世界的路。如果从1796年算起，到1941年，美国的低

姿态历时 145 年 将近一个半世纪。

我们的低姿态才保持了 15 年，许多人就耐不住寂寞了。中国目前的力量如何？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 1/8 是日本的 1/3 实力还差一大截。而且，11 万亿多人民币的 GDP 如果用 13 亿人口一除，将变得非常渺小。再来一个而且，我们搞出这些 GDP 是以严重牺牲环境和严重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如果用绿色 GDP 作参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长他人威风 灭自己志气 我们又不是没有和美国交过手 朝鲜战争时 我们小米加步枪，不是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打败了吗？可是，我们要知道 那是迫不得已。那时候 我国领导人也曾努力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一门心思要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爆发 打乱了中国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并不乐意。况且，美国也太嚣张，居然把炸弹扔到了中国土地上。如果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有理由不奋起反击。问题是，现在尚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至于说领导世界，那不是我们的国策。领导就是称霸。邓小平同志早就向世界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请注意“永远”这两个字 这是说 不仅现在不称霸 将来实力强大了 有条件称霸了 也不称霸。

为什么？霸权主义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人类发展到今天 人类文明

发展到今天，各国不会允许头上压着一个霸主对自己发号施令。霸权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如同中国的袁世凯称帝一样。

对外政策讲究连续性，国策讲究长期性 不能像小孩子的脸，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也无论中国实力如何迅速壮大 基本国策不能变。

我们要耐住寂寞，要埋头苦干。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 是“冷静、冷静、再冷静 埋头实干 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

我们自己的事就够多够麻烦的了，许多事情成堆，一团乱麻一样，要一件件理清楚、理顺，需要时间。要在各个方面都赶上发达国家，没有 100 年时间恐怕是不行的。

国外有人说 国内也有人说 到 2020 年，中国就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用含金量不高的 GDP 衡量，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即使如此，也不说明综合国力可以高居第二位。

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进入大国时代，进入强国时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考验。低姿态不仅需要大智，也需要大勇。

这个勇主要表现在战胜自己上。中国人民百年来遭受的侵略、奴役、欺凌和屈辱 刻骨铭心 因而在意识的深处种下了复仇的种子。一些人以“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的心